

第二十二章

歷史

香港隨着歷史的發展不斷蛻變，
與時並進，民生逐步改善，
社會日益進步。時至今日，
香港已成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貿易中心之一。

考古發現

香港考古研究始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沿海多處地點出土的古代人類活動遺蹟，證明本港歷史可追溯至六千多年前。從考古學角度來說，香港或許只是華南文化體系的一個小部分，而學者對這方面所知仍屬有限。有香港考古發掘顯示，香港與廣東在新石器時代和青銅器時代的文明發展步伐一致，同樣受到中原文化影響。

最早期的文化在公元前四千年出現，其間經歷環境轉變，海平面由低於目前水平100米處逐步上升，淹沒沿岸一片片的廣闊平原，形成今天的海岸線和環境生態。在該地區生活的人必須適應環境，否則便遭湮沒。

考古發掘發現兩個主要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層。青銅器約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出現，這是香港史前最後一個階段。雖然當時沒有廣泛使用青銅器，但香港考古遺址曾有矛頭、箭鏃和戈等精巧青銅兵器出土，也發掘到刀、魚鈎和斧等青銅工具。在原赤鱗角島過路灣、大嶼山東灣和沙螺灣、屯門掃管笏，以及南丫島大灣和沙埔村出土鑄造青銅器的石範，足證本港有鑄造青銅器。

青銅時代陶器的印紋，大都與新石器時代晚期陶器的幾何圖案一脈相承，但其中的“夔龍”、“夔紋”則是該段時期區內特有的紋飾。

早期中國文獻稱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居民為“越人”。因此，至少有部分本港史前先民可能是“百越人”(各類“越人”的統稱)。

此外，在大嶼山石壁、滘西洲、蒲台島、長洲、東龍洲、港島大浪灣、黃竹坑和歌連臣角等地點，也發現了幾何圖案和狀似動物圖案的石刻，很可能是本地先民所刻鑿。

秦(公元前二二一至二零六年)漢(公元前二零六年至公元二二零年)兩朝揮軍南征，平定嶺南。南遷的漢人不斷增加，對原住民產生種種影響，這從本港出土的漢代錢幣可見一斑。不過，這段動盪時期的最重要遺蹟，還是一九五五年在深水埗李屋村和鄭屋村附近發現的完整磚室墓。這座古墓內的陪葬品為典型的漢代明器，被推定為東漢初期至中期的古蹟。在大嶼山白芒、滘西洲、馬灣東灣仔及屯門掃管笏進行的發掘工作，都在文化層出土各類漢代陶器、鐵器和大量銅錢。在旺角渠務工程工地也發現四個陶罐。

本港甚少發現漢代以後的古蹟，而海灘常見的圓拱形灰窰的發掘和研究結果，證明唐代(公元六一八至九零七年)的本地住民曾使用石灰，有助了解時人的生活情況。石灰用途廣泛，是當時很有價值的商品，佔有重要的經濟地位。

公元十三世紀，元兵南下，宋朝覆亡，香港與這段歷史有深厚的淵源。九龍城的宋王臺石刻，大廟灣天后廟附近的宋代石刻，石壁、米埔和奇力島出土的宋代窖藏錢幣，啟德舊機場出土的建築遺蹟，以及在啟德、九龍大磡村、大嶼山稔樹灣、石壁和元朗鰲磡石等多處發掘到的宋代青瓷，都是這個時期的文物。

近年的考古研究提供了一些新資料，有助進一步探索明代(公元一三六八至一六四四年)和清代(公元一六四四至一九一一年)的本地歷史。有關的研究包括分析在大嶼山竹篙灣出土的大量明代青花瓷器，這些瓷器在公元十六世紀初製成，手工精巧，是輸往東南亞和西方諸國的外銷瓷器。二零零一年竹篙灣出土了包括房基在內的更多明代文物，顯示當時有人在該處聚居。大埔碗窰遺址的考古調查發現，本地可能早在明代已有窰工開始製造青花瓷器。香港的瓷器工業一直傳承至二十世紀初，歷經三百多年。二零零零年及二零零八年在掃管笏遺址進行的發掘，發現合共九十多座明代墓葬，陪葬品包括瓷器、銅錢和鐵器，為研究明代本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新資料。

東龍洲清代砲台的發掘，令人們得悉砲台的內部結構，以及清末屯駐香港的官兵所使用的日常物品詳情。九龍寨城的考古勘查，發現了寨城的城門遺蹟和南門上兩塊刻有“南門”、“九龍寨城”字樣的石碑。啟德發展計劃的環境影響評估工作，也發現了龍津石橋遺蹟。石橋在一八七五年建成，連接九龍寨城與海岸，用作登岸碼頭。

通商港口

由於香港地瘠山多，水源缺乏，早期的居民認為香港並非安居樂業的好地方。當時香港只有村民約3 650人，散居於20多條村落；另有漁民2 000人，棲宿於港口的漁船上。港

口是香港唯一的天然資產，維多利亞港位置優越，處於通往遠東的貿易通道，不久便成為與中國進行轉口貿易的樞紐。

自一八四一年英國人前來定居之後，香港逐漸發展為商業中心。十八世紀末，英國人支配了廣州的對外貿易，但主要由於中英文化不同、觀點迥異，且外商只准在商館區範圍內活動，不得入城，故他們對當時的情況並不滿意。

初時，中國在貿易得利，銀元大量流入。不過，自一八零零年開始，鴉片貿易蓬勃，形勢即告逆轉。清廷早在一七九九年明令禁止輸入鴉片，但自一八三四年東印度公司喪失對華貿易的特權後，外商為圖暴利，紛紛加入鴉片販運行列，中國銀元外流的情況更趨嚴重，而吸食鴉片更嚴重影響中國人民的健康。有見及此，清廷在一八三九年三月派遣欽差大臣林則徐赴粵，厲行禁煙。林則徐抵粵一周，立即派兵封鎖商館，不准任何人離開，又斷絕糧食供應，直至外商交出全部鴉片為止。他着令外商和船長具結，以後不得再輸入鴉片，違者正法。英國商務監督義律和其他英商被圍困六星期後，被迫下令繳出鴉片共20 283箱。

義律其後向英廷詳細報告，並決定在接獲指示前暫停通商。英僑於是撤離廣州，暫居澳門，但因澳葡總督聲言難以保障他們的安全，英僑在一八三九年夏季全部退居香港港內的船舶上。

英國遠征軍在一八四零年六月開抵中國，發動第一次鴉片戰爭(一八四零至一八四二年)。雙方且談且戰。林則徐在初步談判失敗後遭撤職，由琦善接任欽差大臣，並與義律達成協議，戰事才告一段落。

一八四一年一月二十日，義律根據《穿鼻草約》的談判內容，提出割讓香港島。英國海軍於一月二十六日在水坑口(即今日上環荷李活道公園一帶)登陸升旗，香港正式成為英國屬土。同年六月，義律把土地分段出售，香港開始有人定居。兩國政府都不承認《穿鼻草約》。中國視割地為奇恥大辱，舉國震怒，琦善被解京查辦。英國外務大臣彭瑪斯頓勳爵也大表不滿，認為香港是“一個杳無人煙的荒蕪小島”，不足以代替通商條約。

彭瑪斯頓勳爵嚴厲譴責義律漠視訓令，並以砵甸乍爵士取代義律。一八四一年八月，砵甸乍爵士抵達香港，決心以武力解決問題。一年後，砵甸乍爵士揮軍溯長江而上，直迫南京，中英雙方最終在一八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訂立《南京條約》，戰事才告平息。

當時，英國維新黨政府下台，新上任的保守黨外務大臣阿巴甸勳爵在一八四一年向砵甸乍爵士發出新訓令，撤回割地的要求。砵甸乍爵士在冬天停戰時返抵香港，對香港的發展甚為滿意，在訂立《南京條約》時不僅訂立通商條約，而且要求中方割讓香港。

清政府還須開放廣州等五個地點作為通商口岸，有關的通商條約其後併入一八四三年十月簽訂的《虎門善後條約》。根據條約，華人獲准自由到香港經商。

租借新界

中英雙方對前訂條約的詮釋各執一詞，最後引發第二次中英戰爭(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兩國在一八五八年簽訂《天津條約》，英國可派遣外交代表到中國，戰事暫時結束。英國第一任使節是香港首任布政司布魯司爵士，他奉命前往北京呈遞國書，但途經大沽突遭炮轟，戰火於是在一八五九年再起，到一八六零年才平息。

從本港早期照片所見，參與第二次遠征的英軍曾在九龍半島結營，他們發現當地環境適宜，遂擬保留作駐防之用。經英國駐廣州領事白加士爵士與兩廣總督交涉後，英國獲得九龍半島南端(北至界限街)連同昂船洲的租借權。一八六零年，戰爭結束，兩國訂立《北京條約》，九龍半島正式割讓予英國。

及後，歐洲各國和日本也相繼向中國要求租借土地。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結束，德、法、俄三國曾為中國說項，自此需索更多。局勢趨於緊張，英國遂認為必須取得香港鄰近土地的控制權。

根據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在北京簽訂的條約，中國同意把九龍界限街以北直至深圳河的地方和235個島嶼，租借給英國，為期99年。中國軍艦仍有權使用九龍城的碼頭，中國仍然保留該處的行政權，“惟不得與保衛香港之武備有所妨礙”。一八九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英女皇會同樞密院議決撤銷這項條款，由英國單方面接管九龍城。在此之前，英國人已在一八九九年四月接管新界，初時仍有零星反抗，但後來終告停止。新界遂成為香港的一部分，但與市區分開管理。

初期發展

香港初期發展並不順利，不良分子麋集，罪行猖獗，熱病和颱風威脅居民的生命財產，但出乎意料，仍然有很多華人移居這個由外國人統治的小島。一八五一年，香港有人口32 983人(華人有31 463人，佔總人口的95%)；一九三一年，人口增至878 947人(華人有859 425人，佔總人口的97.8%)。

香港漸漸成為中國移民的聚居地，以及與海外華僑通商的中心。使用本港港口的遠洋船，由一八六零年的2 889艘增至一九三九年的23 881艘。香港主要與中國通商，因此不得不順應中國習慣，在一八六二年採用銀元制。中國在一九三五年放棄銀元本位，香港也隨之改變幣制。

香港政制採取英國海外屬土常用的模式，總督由英廷任命，行政立法兩局議員由政府委任，大多數為官守議員。立法局第一批非官守議員在一八五零年獲委任，至一八八零年才有首位華人議員(新加坡出生的律師伍才(又名伍廷芳))；行政局在一八九六年開始有非官守議員，而首位華人議員(周壽臣爵士)則在一九二六年獲委任。長期以來，香港總商會和非官守太平紳士這兩個選舉團體，都有權各自提名一人為立法局議員，但這項安排已在一九七二年終止。

在港居留的英國人數度力促成立自治政府，但英廷一直不予首肯，稱香港華人佔多數，難以由少數歐籍人士統治。一八八三年政府成立衛生局，並由一八八七年開始以選舉方式選出部分成員。衛生局在一九三六年改組為市政局。

最初英廷有意從中國內地借調官員管理香港的華人，但這種並行的政制並未認真實施，而且由於罪案日多，最終在一八六五年被廢除，並由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取代。同年，英廷大幅修訂香港總督的訓令，規定“如任何法例對亞非裔人士有所禁制，而歐籍人士則不受其限者”，總督不得批准施行。政府採取自由放任政策，把香港發展為開放營商貿易之地，一切秉公辦理。

當時，香港的公用事業相繼開辦，計有一八六一年成立的香港中華煤氣公司、一八八五年的山頂纜車公司、一八八九年的香港電燈公司、一九零三年的中華電力公司、一九零四年的電車公司等。至於九廣鐵路，則在一九一零年建成。自一八五一年起，香港陸續進行填海工程，較重要的是一九零四年完成的中環填海工程，以及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間進行的灣仔填海工程。現在的遮打道、干諾道和德輔道，都是在中環填海之後闢建出來的。

一八四七年，香港政府推行公立學校教育制度，補助中文學校的經費。一八七三年，主要由教會營辦的義學也納入政府補助計劃內。香港華人西醫書院在一八八七年成立，當時有兩名學生，其中一人是孫中山先生。書院在一九一一年擴展成為香港大學，開設文學院、工學院和醫學院。

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推翻滿清政府後，中國長期動盪不安，不少人來港避亂。中國雖曾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但未能藉《凡爾賽和平條約》收回德國在山東的租借地，加上戰後國民黨推行急進政策，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動盪局面一直持續。

中國當局力爭廢除外國憑藉條約取得的一切特權，外國貨被抵制，不安的局勢蔓延至香港，一九二二年發生海員罷工事件，一九二五至二六年間在廣州發生的事件還演變為省港大罷工。當時，英國為排外運動的主要目標，但反日情緒不久便取而代之。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與第二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向中國提出二十一條條款。一九三一年，日軍佔領東三省，並企圖吞併華北省份，終於導致一九三七年日本全面侵華。一九三八年，廣州淪陷，大批難民湧入香港。估計在一九三七年抵港的難民約有十萬人，一九三八年有50萬人，一九三九年則有15萬人，令香港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增至160萬。難民抵港的高峯期，估計約有50萬人流離失所，露宿街頭。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空襲珍珠港，轟炸美國軍艦，正式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差不多同一時間(香港時間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取道中國大陸，進攻香港，英軍被迫撤離新界和九龍，退守港島。

當時守軍包括香港義勇軍，苦戰一星期後，因眾寡懸殊，難扭劣勢，終在聖誕日投降。

日本佔領香港三年八個月。淪陷時期貿易停頓，貨幣貶值，糧運不繼，政府服務和公用事業大受影響。不少人避居中立的葡屬澳門，澳門政府也盡量收容。日治末期，為解決糧荒，日本人驅逐大批居民離境。

本港居民雖然備受壓迫，但大部分仍擁護抗日陣線。一九四二年二月，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在西貢黃毛應村成立，他們四出攻擊日軍的據點和海上航運路線，也與盟軍合作，營救戰俘。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投降。消息傳來，淪陷期間被囚赤柱監獄的布政司詹森(後獲封爵士)隨即組織臨時政府。八月三十日，海軍少將夏愨爵士率領英國太平洋艦隊抵港，成立臨時軍政府。一九四六年五月一日，總督楊慕琦爵士回任，香港正式恢復民政統治。

戰後發展

戰時，不少華人由香港返回內地。日本投降後，他們紛紛回港，每月幾達十萬人之多。香港人口在一九四五年八月原已減至約60萬，但到一九四七年年底卻激增至180萬左右。一九四八至四九年間，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失利。很多人從內地湧入香港，人數之多，破了歷來紀錄。一九四九至五零年春，有數十萬人移居香港，他們主要來自廣東省、上海和其他商業重鎮。至一九五零年年中，估計全港人口已達220萬。此後，香港人口不斷增加，一九七一年達400萬，一九八零年達500萬，一九九四年達600萬，目前已超逾700萬。

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大量人口湧入香港，寮屋數目因而激增。一九五三年聖誕節，一場木屋區大火令53 000名居民無家可歸。政府急須安置災民，香港的公營房屋計劃亦由此展開。時至今日，本港已有周全的公營房屋計劃，提供公共租住房屋(公屋)單位和

資助出售單位。二零一九年第四季，約有30%和約15%的人口分別居於公屋單位和資助出售單位。

韓戰爆發，聯合國於一九五一年對中國實施禁運，香港經濟停滯不前，加上人口激增，單靠港口已不足以維持繁榮。隨着紡織廠相繼設立，香港的製造業開始興起，產品種類逐漸增加，至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已擴展至生產人造纖維和成衣，所輸出的紡織品和成衣佔本地產品出口總值約一半。

一九六六年，內地爆發文化大革命，香港局勢日趨緊張。一九六七年，本港發生連串社會騷亂，市民生活大受影響，經濟陷於癱瘓。幸而情況在年底受到控制，本港得以恢復平穩發展。

香港的轉口港業務不斷發展，與內地的貿易增長尤為迅速。此外，香港的旅遊業日益蓬勃，交通也大為改善。在地理環境上，香港是內地的天然門戶，每年從香港啓程或過境進入內地的旅客愈來愈多。

政府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推行兩項高瞻遠矚的計劃，影響深遠，逐步塑造出香港現今的面貌。首先，為配合十年建屋計劃，政府在一九七二年決定在新界發展多個新市鎮。在隨後的20年間，香港共發展了九個新市鎮。目前，香港大約有47%人口住在這些新市鎮，紓緩了市區的發展壓力。政府在一九七六年制定《郊野公園條例》，為設立郊野公園及特別地區提供了法律依據。現時，香港有24個郊野公園和22個特別地區，約佔香港土地面積40%，保育不同的自然生境。

一九七五年，越戰結束，大量越南難民湧入香港。截至二零零零年最後一個難民營關閉為止，共有超過20萬名越南難民來港，當中超過143 000人獲安排移居海外，約72 000人被遣返越南。

邁向新世紀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隨着新界租借期限將於一九九七年屆滿，香港開始面對不明朗的前景。一九八二年，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訪華，與中國領導人商討香港前途問題，揭開了中英政府持續兩年談判的序幕。雙方最終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就香港問題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聯合聲明》闡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包括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決定。

香港特區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於同日生效。《基本法》是香港特區的憲制文件，規定香港須施行的制度，並以法律的形式，訂

明“一國兩制”、“港人治港”和高度自治等重要方針。為落實這些方針，《基本法》訂明，香港特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變。

香港經歷的轉變不限於政治方面。多年來，製造業的生產重點由當年簡單而勞工密集的產品，轉移至今天精密先進的高增值產品。工業家看準珠江三角洲豐富的土地和人力資源，遂跨越邊界，把生產基地向北擴展，營運總部則仍然留在香港。這種經營模式有助推動區內經濟發展，促使香港蛻變成一個以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系。二零一二年，本地產品出口佔出口總額不足2%。

政府致力改善和增建基礎設施，以配合各項發展。四通八達的道路和鐵路，一流的港口和機場設施，令香港成為一個現代化都會。新建的公路令偏遠地區的交通大為改善，鐵路網絡也陸續擴展。位於赤鱘角的香港國際機場，在一九九八年落成啓用。

經濟基礎日趨穩健，政府得以逐漸增加教育、社會福利、衛生和其他民生方面的開支，總額由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的2,890億元增至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預算的6,078億元。

由二零零八年起，政府為入讀公營學校的所有學生，提供12年免費的小學和中學教育；同年，職業訓練局也免費為中三離校生提供全日制課程。此外，專上教育也繼續獲政府大幅資助。

本港的社會福利服務更臻完善和普及。過去十年，政府的社會福利開支由二零零九至一零年度的404億元增至二零一九至二零年度預算的972億元，增幅超過一倍。

香港的醫療體系在戰後初期建立，以應付不斷增長的人口。其後，政府致力擴展醫療體系，以保障公眾健康和為全港市民提供醫療護理及設施。一九九零年，政府成立獨立運作的醫院管理局，負責管理所有公立醫院，並基於不應有人因經濟困難而得不到醫療服務的原則，提供由政府大幅資助的公營醫療服務。截至二零一九年年底，該局轄下有43家公立醫院和醫療機構、49家專科門診診所及73家普通科門診診所。

香港有完備的勞工法例，以保障僱員的權益、福利和職業安全與健康，求職人士和僱主均可免費享用就業和招聘服務。僱員再培訓局於一九九二年成立，現時為年滿15歲而教育程度在副學位或以下的人士提供培訓及再培訓課程和服務，以配合不斷轉變的勞工市場需要，並為各行各業提供新的人力資源。